政治科學論叢／第三十八期／民國 97 年 12 月／頁 35～70

中共領導人權力消長在黨報新聞照片上的呈現*

寇健文**、梁書瑗***

摘　要

本文的核心論點是「領導人權力的消長導致黨報刊登領導人照片的編輯手法出現變化」。受到黨性原則的影響，黨報的辦報理念、編輯方針必須與中共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保持一致。這使得黨報刊載的政治新聞，無論是在新聞文字或是新聞照片上，都會反映出領導人對重要政策的態度，也能透露領導人權力消長的蛛絲馬跡。因此，黨報刊登的領導人照片可以幫助外界了解中共高層互動的情形，減輕資訊不足的困擾。以往中外學者僅指出照片是研究共黨國家的一種資料，但均無系統性研究。本文利用照片曝光頻率、版面優劣位置、合照照片構圖等指標，建立一套觀察方法。依循典型個案分析（typical case study）的研究方法，本文以 2002 年 11 月到 2005 年 2 月之間《人民日報》刊登的 515 張胡錦濤、江澤民照片爲例，展現上述觀點。結果發現《人民日報》編輯手法的變化趨勢吻合胡錦濤、江澤民兩人權力的消長情形。這套方法提供外界觀察未來中共領導人權力消長過程的線索。

關鍵詞：中共、菁英政治、版面語言、新聞照片、黨報、黨性原則

---

* 本文初稿發表在 2007 年台灣政治學會年會，台灣政治學會主辦，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協辦，台北，2007 年 11 月 17-18 日。筆者感謝政大政治系劉義周教授、政大東亞所關向光教授和博士生鍾延麟、政大新聞系講師師溫禾等人在寫作過程中的建議，以及兩位匿名審查人的寶貴意見。

** 政大政治系副教授，E-mail: cwkou@nccu.edu.tw

*** 政大政治系學生，E-mail: 92202035@nccu.edu.tw

收稿日期：97 年 1 月 29 日；通過日期：97 年 11 月 4 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壹、前 言

在質性研究中，照片是一種有價值的研究材料。照片不但清楚描述場景、人物、事件等社會現象的具體細節，同時反應解攝影者內心的價值觀。因此，分析照片時，不但要看照片本身對現象的描述，也要了解攝影者的動機及其所處的歷史文化背景（陳向明，2004：356-357）。如果照片是有價值的資料，報紙刊登的新聞照片自然可以做爲學術研究的一手材料。事實上，一張照片的說服力不亞於一篇重要新聞，兩者同樣扮演傳遞資訊的角色（安崗，1982：91；Berner, 1991: 223；Copperud and Nelson, 1983: 183）。用圖片、照片表達訊息的震撼力甚至比文字報導更直接、更具震撼力。這是因爲從讀者的角度來看，新聞照片在吸收速度、可信度兩方面都比文字稿敘述更勝一籌（Copperud and Nelson, 1983: 183；鍾立群，1997：248）。

在社會主義國家中，新聞事業具有階級性，必須爲無產階級專政的目標服務。「階級性」概念落實在社會主義新聞事業的辦報方針就是黨性原則，亦即正確地向群眾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郝雨、王豔玲，2003：199）。不只是新聞文字，連新聞照片的取景、攝影內容、攝影角度，以及照片在報紙版面的編排也必須與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保持一致，以便符合黨報的黨性原則（李瑞峰，1983：57-58）。[1] 因此，黨內領導人權力變化之際，黨報的照片取捨與版面配置會反映這種變化，甚至出現配合政治需要而變造照片。[2] 既然黨報的新聞照片具有高度政治意涵，這些照片就成爲我們了解中共領導人互動現況的訊息來源。[3]

然而，黨報新聞照片如何反映領導人的權力消長呢？類似研究方法過去曾被學者使用，卻沒有系統地運用。早期西方學者利用黨國體制下的媒

---

1 黨報是指中共縣級以上黨委發行的報紙，可說是中共的喉舌。在宣傳意識型態與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上，黨報比其他報紙更具有權威性（何川，1994：70）。

2 曾任大陸攝影記者 20 年的李振盛表示:「爲適應『政治需要』,我用畫筆造過假照片。……那時突出政治是比天還大的任務，誰要是不自覺修改有欠缺的照片就甭想見報」（張裕亮，2006）。

3 大陸學者魏永征（2002：80）甚至指出，從新聞出版物中尋獲情報早就被情報機關視爲最經濟、最安全、最可靠、最迅速的途徑。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體特性，觀察蘇聯領導人在報紙上發表的言論，勾勒該國政情變化（Conquest, 1961: 50-75）。另外，有的學者認爲當時蘇聯領導人之間的權力變化，會反映在電視鏡頭上（Laqueur, 1967: 181）。還有學者分析中蘇兩國領導人在各自黨報上的言論，呈現兩國在史達林死後出現的路線紛爭（Zagoria, 1962: 27-34）。

部分研究中國的學者延續這種研究方法的傳統，分析中共高層權力消長。這些文獻大致可分成兩類：第一類揭示媒體是中共黨內政爭的工具（Goldam, 1994: 23-35；Hood, 1994: 37-57；Wu, 1994: 199；何川，1994：197-220），或是認爲黨報新聞內容可用來分析中共高層權力互動，如 MacFarquhar (1971: 289-307)、楊開煌（1988：69-84）、寇健文（2005b：250-257）、何川（1994：144-147）。另外，有學者分析 1980 年代末期《人民日報》的社論、市民評論、編輯部文章、評論員文章、特約評論員文章之後指出，中共透過灌頂法（the pouring method）、鳥籠法（the birdcage method）以及風箏法（the kite flying method）以確保中央的路線、政策、方針被「正確地」傳播（Wu, 1994）。[4] 儘管一九九〇年代大陸新聞媒體經歷市場化轉型，中共仍緊緊掌握政治新聞的論述權力，利用黨報觀察中共高層的分析方法也沒有走入歷史。

第二類文獻進一步分析中共高層發生權力鬥爭時，黨報版面標題如何反映出權力變化的過程。寇健文、鄭兆祐（2006：37-77）指出，一九七八年、一九八九年、一九九二年中共爆發嚴重鬥爭時，敵對派系主要領導人的人名大量出現在《人民日報》、《解放軍報》頭版新聞的標題。等到鬥爭結束後，領導人的曝光頻率大減，同時按照領導人新的地位報導相關新聞。在上述文獻中，雖然已經有人提到黨報新聞照片具有分析價值，但缺乏長時段、系統性的分析，往往流於詮釋少數照片。這種詮釋少數照片的方法若用於分析進行中的權力鬥爭時，難免出現眾說紛紜的困擾。如此一來，黨報照片便不能成爲可靠的原始資料。本文的目的即在補充此一缺

[4] 灌頂法意指直接由上（高層領導人、中宣部）下令評論員撰寫文章，貫徹其意志。鳥籠法是指以領導人的政策路線爲框架，允許評論員在這個範圍內自由評論。風箏法則是指領導人允許評論員擁有某些論斷事物的空間，但領導人的意念則像是風箏的繩索，在一定範圍內牽引著評論員的觀點，使之不至於「偏差」（Wu, 1994: 199-20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陷。這個結果可以幫助外界觀察、評估未來中共領導人權力交接的進展。[5]

本文認爲，領導人權力消長導致黨報處理他們新聞照片的編輯手法出現變化，而這種變化會反映在照片曝光頻率、版面優劣位置、合照照片構圖等三個指標。換言之，領導人權力消長是自變項，黨報處理他們新聞照片的編輯手法爲依變項。爲了闡述上述觀點，本文根據「典型個案分析」（typical case study）的方法，分析二〇〇二年十一月到二〇〇五年二月之間，《人民日報》刊登的 515 張江澤民、胡錦濤照片。結果發現《人民日報》編輯手法的變化吻合胡錦濤、江澤民兩人地位的消長情形，其中又以曝光頻率、版面優劣位置兩個指標最明顯。隨著胡錦濤接掌重要黨政職務，經過 SARS 危機的歷練，逐漸掌握權力，《人民日報》在刊載領導人照片時也隨之凸出胡錦濤；反之，江澤民的照片則逐漸從《人民日報》版面中消失。正是因爲「黨性原則」的存在，使得《人民日報》編輯手法的變化趨勢反映他們兩人權力消長的過程。

本文主要分四個部分。第二節簡述黨性原則、新聞版面與新聞攝影之間的關係。第三節則討論本文的個案選擇、研究範圍，以及曝光頻率、版面位置、照片構圖等三個分析指標。第四節根據前一節的討論，呈現江澤民、胡錦濤兩人的新聞照片在《人民日報》的變化。第五節提出本文的結論與建議。

貳、黨性、版面與新聞攝影

一、 黨性原則、新聞標準與政治標準

在西方報業傳統中，新聞意指最新且吸引讀者的資訊（Berner, 1991: 84-85）。根據這個定義，西方傳播學發展出重要性、時效性、接近性、顯著性、影響性、人情趣味等評斷新聞價值的標準。與西方報業相較，中國

[5] 至於過去已發生的權力交接或內部鬥爭個案，由於中共權力更迭已漸透明，外界在事後多半能了解大致經過與結局，無須透過黨報照片進行了解。這是本文強調觀察「未來」高層互動的原因。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報業版面設計最大的不同處在於必須考慮政治標準。[6] 政治標準的出現，與社會主義國家報紙的階級性有關。民主國家將新聞視爲社會公器，獨立於政府之外，並提倡資訊自由流通（Hachten and Scotton, 2005: 151），但共黨國家新聞媒體的宣傳功能更甚於報導功能（甘惜分，1980：36）。在社會主義新聞學中，新聞媒體只爲特定社會階級而服務。列寧曾指出，新聞事業必定由某些階級掌握（列寧，1995：660）。因此，無產階級必須發展出自己的新聞媒體，宣揚自己的政治主張，營造有利於自身的社會輿論環境，以便在階級鬥爭中取得勝利（郝雨、王豔玲，2003：197）。

根據新聞媒體的階級性和共產黨領導無產階級革命的觀點，社會主義國家發展出黨報的黨性原則。黨性原則使得領導人地位與黨報版面發生因果關係。黨報的黨性原則是指「黨報必須無條件地服從黨的領導」（陳力丹，1988：60）。這個原則是列寧在一九〇五年《黨的組織和黨的出版物》一文奠定基礎，中共歷代領導人的相關論述也都源自於這篇文章（王雄：2002，86-87）。[7] 既然新聞事業是無產階級的輿論工具，那麼正確地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便是無產階級新聞事業的首要課題。鄧小平曾表示，黨報要無條件地宣傳黨的主張，不允許對黨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任意散佈不信任、不滿和反對意見（鄧小平，1983：236）。既然黨報是政黨的宣傳機構，所以黨報往往從宣傳角度選擇新聞，特別重視對黨「有利無利」的原則（李良榮，1992：164-165）。[8] 這種考量使得中共媒體有時

---

6 中國報業將選擇新聞的標準分爲政治標準和業務標準（即新聞標準）。政治標準就是四項基本原則；業務標準則是⑴注意新聞的構成因素（五個 W，和一個 H），⑵注意新聞的眞實性與時效性（鍾立群，1997：112-113）。五個 W 意指誰（who），新聞主角；什麼（what），說明究竟發生什麼事；地點（where），新聞發生地；時間（when），說明新聞發生的時間；爲什麼（why），說明新聞發生的原因。而 H 指如何（how），說明新聞發生的情況及經過（石麗東，2003：147）。

7 在《黨的組織和黨的出版物》一文中，列寧訴求「寫作事業應該成爲無產階級總的事業的一部分，成爲由全體工人階級的整個覺悟的先鋒隊所開動的一部巨大的社會民主主義機器的『齒輪和螺絲釘』。寫作事業應該成爲社會民主主義有組織的、有計畫的、統一的黨的工作的一個組成部分。」此處所說的寫作事業包括文學和新聞出版事業，引述自王雄（2002：87）。

8 一個媒體配合中央政策發布新聞稿件的例子是 1989 年 5 月 20 日國務院下達戒嚴令，22 日新華社北京分社配合發出「北京城區氣氛趨於緩和」的新聞，呼應中央的立場，反映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犧牲新聞的即時性，在事實發生一段時之後才公開報導（何川，1994：54-55）。

一九九二年十四大以後，傳媒市場化成爲中國新聞業的發展主流（杜耀明，2000：61；陳懷林，2000：98）。然而，市場轉型與新聞自由仍有一段距離。在媒體商業化的大環境下，中共僅釋出經濟利益與有限的編採自由（Zhao, 2000: 21-22），黨性原則仍是傳媒的核心價值。中共進行新聞改革的目的在於加強和改善黨對新聞工作的領導，而不是削弱這種關係（本刊評論員，1993：3）。原《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也曾指出，新華社仍然控制重要新聞發佈權，重要政治評論權也還在《人民日報》手上（何川，1994：23）。換言之，傳媒市場化並不代表黨國退出傳媒，而是變成在黨國控制的鳥籠下，讓市場力量促進媒體的經營與發展。[9]

二、控制媒體的主要機制

爲了實踐黨性原則，中共要求各報紙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都必須遵從中共的路線、方針、政策（林楓，1991：108），而中共堅持的黨性原則就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丁柏銓等，2006：239）。爲了落實黨性原則，中共透過人事安排、媒體登記制度、黨委下達宣傳重點、審讀制度、懲戒違法違規人員等等機制控制媒體。接下來本文就分別說明這些控制機制。首先，中共控制主要媒體的人事任免。黨報的編採人員一般都是中共黨員（何川，1994：98；104-106），重要媒體主管列入幹部等級排序，而非純粹的民間專業人士。《人民日報》和新華社、中央電視台等級別最高的媒體屬於正部級單位，它們的最高負責人由中組部與中宣部聯合審查，中央高層確定人選。[10] 其他媒體處級以上主管則由同級黨委組織部考察，再與人事部門聯合任命（何清漣，2006：143-144）。

戒嚴對維護秩序的正面作用（徐光春，1992：30）。

9 關於中國媒體受到市場化與黨國控制兩股力量的交互牽引，導致在經營分配制度、編採運作制度、宏觀管理制度三方面向不同速度的發展，見陳懷林（2000）。李良榮（2006）也提出市場化與黨國控制並存的觀點。

10 按中共人事任免的程序，政治局常委會審議提出正部級幹部人選，提交政治局討論決定，見寇健文（2006：4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其次，中共對報紙實行註冊登記制，由國家新聞總署和各省新聞出版局負責審批等業務管理工作。[11] 相關法規規定，報紙應有擔負領導責任的主辦單位和主管單位。主辦單位對所屬媒體的新聞錯誤負起責任，主管單位則須是黨政機構(或工會、婦聯、共青團等具有官方地位的非黨政機構)。主管單位與出版單位之間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何清漣，2006：117-118）。

再者，中央或地方黨委宣傳部門經常根據情勢需要，決定某一時期的報導重點。不僅督導媒體正面宣傳官方政策，並且隨時頒佈禁止刊載的指令。舉例來說，周恩來擔任總理期間，每當發生國際重大事件，都會根據中共立場，訂定報導方針。對於那些問題應該凸出報導，那些新聞放在次要版面位置，那些新聞緩報或不報都有明確指示(熊昌義，1992：161-162)。又如上海市委每季都會召開主要媒體負責人座談會，由市委書記、市長、宣傳部長直接向新聞單位通報情況，下達任務，並聽取各新聞單位簡報（葉世濤，1992：49）。

此外，中共建立審讀制度，檢查報導內容是否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以及是否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審讀制度是透過報社內部自我審查和送審兩個階段所組成（Wu, 1994: 205）。新聞媒體發表現任或曾任政治局常委、國家正副主席、國務院總理、軍委主席、全國人大委員長、全國政協主席等主要領導人的作品時，必須先送交領導人指定的部門或人員審批。即使是關於領導人的一般性報刊文章，也要按媒體級別送主管單位審核，再報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審批。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可視情況轉請中央宣傳部審查，或請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黨史研究室、軍事科學院等部門協助審核。《人民日報》等級別最高的媒體則有自己的審批程序。此外，發表和出版有關仍健在領導人的活動報導、談話內容、圖片等等，都必須徵得本人同意。上述領導人的身邊工作人員、戰友和子女、親屬撰寫的作品若有涉及領導人工作和生活情況的內容者，也必須專題報批。[12]

---

[11] 關於中共建立媒體登記制度的歷史、審核機關、審查條件與程序，見魏永征（2002：217-220）。

[12] 這些相關規定散見《關於改進新聞報導若干問題的意見》（中央宣傳部、中央對外宣傳小組、新華社頒布，中宣發文，「1987」9 號，1987 年 7 月 18 日）、《關於加強對報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爲了確保與中央保持一致，《人民日報》的重要評論文章慣例上都會經過領導人審閱（李庄，1993：187）。如在一九七八年真理論戰之前，《人民日報》評論文章需先經政治局常委汪東興審閱同意，才能刊登（Goldman, 1994: 24；楊繼繩，2004：113；胡績偉，1998：35-65）。有些評論文章則是根據高層領導人的指示或講話編輯而成，甚至是由最高領導人親自撰寫或修改而成。如毛澤東爲新華社和《人民日報》撰寫或修改的評論與新聞就有 150 餘篇（何川，1994：110），周恩來親自爲《人民日報》批改的社論與評論至少超過 754 篇（崔奇，1988：12）。劉少奇也曾經審閱過《人民日報》社論（胡績偉，1988：275）。

最後，中共在國家法令中明定媒體必須遵守黨性原則，同時要求從事新聞工作的黨員遵守黨紀。舉例來說，一九八〇年頒布的《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規定黨員不得在報刊、廣播中公開發表與中央決定相反的言論（本書編寫組，2002：89-90）。一九九七年《中共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試行）》針對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公開反對四項基本原則，刊登、廣播、出版有嚴重政治問題的文章或出版物等情節，規定不同程度的黨紀處分（本書編寫組，2002：37-38）。另外，《出版管理條例》（二〇〇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頒佈）第二十六條規定禁止刊載反對憲法確定的基本原則（即四項基本原則）。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中國記協）制定的《中國新聞工作者職業道德準則》（一九九七年一月第二次修訂）規定，新聞工作者必須堅定地宣傳黨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不得宣傳違背中央決定的內容。若有違反相關規定的情形，中共就以違紀違法名義

紙、期刊、圖書審讀工作的通知》（新聞出版署頒布，（88）新出期字 1285 號，1988 年 11 月 9 日）、《關於對描寫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的出版物加強管理的規定》（中央宣傳部、國家新聞出版署頒布，1990 年 5 月 5 日）、《關於發表和出版有關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工作和生活情況作品的補充規定》（中央宣傳部頒布，中宣發文〔1993〕5 號，1993 年 2 月 15 日）、《關於期刊發表有關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工作和生活文章、圖片的規定》（國家新聞出版署頒布，新出期〔1994〕721 號，1994 年 8 月 26 日）、《關於重申對出版反映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工作和生活情況圖書加強管理的緊急通知》（新聞出版署頒布，新出圖〔1997〕15 號，1997 年 1 月 24 日），見中共江西省委宣傳部、江西省新聞局（2000，61-63、70-74、253-255）；與北大信息網（http://law.chinalawinfo.com）。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處分媒體與新聞從業人員（何清漣，2006：127-128）。在這種工作環境下，多數大陸新聞從業人員自然會產生強烈的自我檢查（self-consorship）心態，避免誤踩紅線，造成本身失業或是牢獄之災。這種新聞從業人員的心態因而成爲中共控制新聞媒體的一種重要機制（Hassid, 2008: 421-429）。

三、新聞攝影

從上述討論可以發現，黨性原則使得黨報必須反映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以及領導人的政治地位。若是如此，黨報新聞照片又扮演什麼角色呢？黨報的新聞攝影不只考慮「攝影者主體」與「讀者取向」的因素，還必須受制於黨性原則。這正是中西方新聞攝影最大的不同處。對中共黨報來說，新聞攝影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它的真正目的是通過報導事實，宣傳某種觀點，爲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李瑞峰，1983：57-58；劉雲萊，1993：34）。記者李振盛曾表示，他在文革時期曾因政治需求而變造照片（Li, 2003: 132）。攝影記者杜修賢則指出，「中南海的攝影師……不僅要求攝影技術的嫻熟，更多的是政治上的成熟（杜修賢、顧保孜，2004a：44-45）。」[13] 換言之，黨性原則不僅存在於黨報新聞文字，也存在於新聞照片中。新聞照片不僅要傳遞訊息，還被賦予遵循黨性原則傳播「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功能。

中國新聞攝影史曾在不同時期出現的「變造照片」，就是「爲政治服務」的最佳例證。舉例來說，一九六七年政治局常委陶鑄下令將照片中陳毅的頭換成鄧小平的頭，遭到毛澤東整肅（陳永發，2001：876）。在一九七一年林彪墜機身亡之前的幾個月，毛澤東與林彪的關係已經出現危機。爲了維持「緊密團結」的假象，報社甚至被迫使用兩人合照的舊照片魚目混珠，刊登在黨慶當日的報紙上（杜修賢、顧保孜，2004b：206-207）。在文革時期，四人幫經常依據「政治需要」竄改照片，甚至刻意佈置背景拍攝照片，致使新聞攝影經常在各種「政治需要」的藉口下遭到變造（何

[13] 杜修賢自 1960 年起先後擔任新華社駐中南海攝影組副組長、組長，1971 年起擔任新華社攝影部副主任兼中央新聞組組長、中央外事攝影協作小組組長。他在 1960 年起擔任周恩來專職攝影記者，1970 年起再負責毛澤東的新聞攝影工作。關於杜修賢的經歷，見杜修賢、顧保孜（1998：書前摺口；2004a：44；2004b：3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川，1994：51；蕭緒珊，1980：79；戴邦等，1984：284；陳永發，2001：714-715）。文革四人幫垮台後，他們在毛澤東悼念大會照片中的影像隨之消失，又是一個變造照片的例證。[14] 即使到了二〇〇四年，胡錦濤與鄧小平握手合照的照片仍出現「三變」的情形。[15]

即使未竄改照片，攝影人員也需利用攝影技巧，表達所需政治訊息。舉例來說，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十大時毛澤東已經病態流露，攝影人員利用各種攝影技巧避開病態表情與被別人攙扶的場景，以便維護毛澤東的領導人形象（杜修賢、顧保孜，2004b：45）。當時周恩來規定拍攝人員在毛澤東外事活動結束後兩小時內，將新聞照片送給他審發，之後再將照片送給四人幫看。他如此親自審閱新聞照片達數年之久。周恩來在審閱照片時，會考慮照片要凸出何人，不凸出何人，甚至誰在前面，誰不該在前面等等細節（杜修賢、顧保孜，2004b：45-48、206）。一九七六年周恩來死後，由姚文元掌握簽發紀念周恩來照片、影片的權力（顧保孜，1994：256-260）。同年毛澤東死後，姚文元強調凸出集體領導，特別注意江青的

---

[14] 原版照片攝於 1976 年 9 月 18 日的天安門廣場，政治局全體成員參加毛澤東主席追悼大會，所有領導人一字站開，低頭悼念毛澤東，以顯示團結一致的形象。四人幫垮台後，該照片遭到修改。修改後的照片前排領導人出現四個空缺，有如缺了四顆門牙的下排牙齒。這四個空缺正是原來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所站之處。大陸學者也曾對此一竄改照片的做法提出批評（蕭緒珊，1980：72-73）。原版照片可在歷史風雲網（http://www.lsfyw.net/character/200503/2978.html）找到，修改後照片登在《人民畫報》，總第 342 期，1976 年 11 月，頁 10。

[15] 第一張被修改的照片刊登在香港文匯報（2004 年 8 月 11 日，版 A7）和上海文匯報（2004 年 8 月 13 日，版 16）。照片主體是鄧小平與胡錦濤握手，鄧楠在旁，背景全黑。照片說明文字寫著「鄧小平百年誕辰展覽中有一張鄧小平與胡錦濤的單獨合影……。鄧楠介紹說，籌備鄧小平畫冊時，家人一直在找這張照片，但怎麼都沒找到。後來我們就問錦濤，你那裡有沒有。果然，錦濤同志珍藏著原版，主動將這張照片捐獻出來。」第二張被修改的照片是新華社在 2004 年 8 月 16 日發布。照片中主體不變，但背景出現模糊的人群坐在大會場的座位上。原版照片在 2004 年 8 月 19 日由新華社下屬的《瞭望東方》雜誌刊登。主體不變，背景不但有模糊的人群坐在大會場的座位上，還有江澤民、喬石、吳邦國、秦基偉、李錫銘、李鐵映等領導人站立於鄧小平與後面人群之間，成爲照片第二排的人物。這張原始照片應該攝於 1992 年 10 月 18 日十四大結束之後，見大陸新聞中心（2004/9/4）；Cheong (2004)。關於這三張照片的並列比對，見田鏡（200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形象，關切新聞照片上的人物細節，誰臉大誰臉小，誰在前誰在後等等（顧保孜，1994：272-277）。由此推知，在無產階級媒體必須服膺於「黨的領導」的前提下，黨報的新聞攝影工作時會傳播中共官方釋放的政治訊息。

四、領導人權力消長與黨報新聞照片

綜合本節前面的討論，黨報是傳遞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訊息管道，一方面傳遞黨的意志，另一方面排除不符合黨的意志的新聞。這種黨性原則不只適用於文字稿，也適用於新聞照片。中共學者、記者的論點與經驗都可證明新聞照片的確是傳遞政治訊息的一種管道。換言之，極權主義體制下，黨對媒體的控制非常嚴格。同時，按照中共多年來形成的習慣，領導幹部講話刊登多少篇幅，放在什麼版面上，用多大的圖片，都已經形成一定規格（丁柏銓等，2006：205）。由於黨緊緊控制媒體（特別是黨報），才使黨內高層權位變化時，也會影響黨報刊登領導人照片的編輯手法。[16]

據此，本文的核心論點是「領導人權力的消長導致黨報刊登領導人照片的編輯手法出現變化」。換言之，本文以中共領導人權力消長爲自變項，黨報照片變化爲依變項，並以中共媒體的黨性原則建立兩變項之間的因果關係，說明兩者之間爲何出現會出現共變性。

---

[16] 關於《人民日報》報導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總書記、國家主席、全國人大委員長、國務院總理、全國政協主席、軍委主席、政治局常委）和其他領導人（國家副主席、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等）的規格，見人民日報編輯部（1997：69-76）、王武錄（2006：13-19）。此外，2003 年 3 月 28 日中共政治局討論改進會議和領導同志活動新聞報導等工作，會後發布《關於進一步改進會議和領導同志活動新聞報導的意見》。該文件指出「多位中央主要領導同志同日分別會見同一位外國元首、政府首腦、議會議長或政黨領袖，發一條綜合消息，報紙可通過消息標題或配發照片等形式體現報導規格」。稟承這份文件的精神，隨後中宣部頒發《關於進一步改進會議和領導同志活動新聞報導的實施辦法》（以下簡稱《實施辦法》）、《〈關於進一步改進會議和領導同志活動新聞報導的實施辦法〉的補充規定》（中宣發〔2006〕38 號）。各省市地方單位也接著頒布轄區內的地方性文件，配合中央政策。由此可見，中共官方確實頒訂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報導規格。在有關人民日報版面的兩本專書中，雖然提到總書記以下黨政領導人的報導規格，唯獨缺漏軍委主席部份。因此，對於總書記和軍委主席由不同人擔任時，人民日報同時報導兩人新聞的原則仍不明朗。感謝審查人提醒作者注意上述文件的存在。第一份文件收錄於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2004：287-290），另兩份文件全文則無法尋獲。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黨報的主要角色在於政治宣傳，其言論觀點與新聞照片的版面配置自然會表現黨內領導人的地位。若領導人之間無重大路線紛爭，也沒有發生地位消長的時候，黨報版面配置應該會符合領導人各自的身分，呈現穩定的模式。然而，領導班子一旦出現嚴重路線分歧、權力鬥爭，或權力轉移的情形時，由於原有權位順序被破壞，黨報編輯手法就會出現混亂的情形。一直到政治干擾因素消失之後，黨報版面配置又回到穩定狀態，按照新的權位順序刊登領導人新聞照片。本節討論完本文的基本觀點之後，下一節將接著說明本文的研究設計。

參、研究設計

一、個案選擇：「典型案例分析」

爲了闡述前述論點，本文選定二〇〇二年十一月十六日至二〇〇五年二月二十四日之間，《人民日報》頭版中江澤民、胡錦濤兩人的新聞照片，比對 515 張兩人照片在曝光頻率、版面位置、照片構圖等三方面的變化走勢，做爲佐證案例。這種個案選擇方式是屬於「典型個案分析」（typical case studies）。「典型個案分析」是個案研究中的一種方法，指研究者在研究進行前先有一論點，接著在母體中挑選最適合、最具代表性的個案，藉此使此論點得到經驗上的支持（Gerring, 2001: 218-219）。這種方法也類似 Harry Eckstein 提出的「啓發式個案研究」（heuristic case studies）（Peters, 1998: 148）。「啓發式個案研究」的目的在於藉由一個個案的分析，發現變項間潛在可普遍化的關係（potentially generalizable relations），因此這種個案選擇較重視因果關係的建立（Eckstein, 1975: 104）。不過，由於研究對象只有單一個案，其研究成果只應視爲理論建構的初步線索。換言之，這種個案分析法雖可做爲了解政治現象運作的實用教材，但需要累積更多的案例研究，以便建立真正的通則。因此，本文係以江、胡權力交接個案爲例，「闡述觀點」，並非「驗証假設」。

首先，本文選定最能代表「黨的立場」的《人民日報》，做爲照片來源。《人民日報》是中共中央委員會的機關報，屬於中共中央直屬事業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機構，與中央宣傳部、中央組織部等直屬工作部門同爲黨中央的直屬機構。[17]《人民日報》也承認，由於身爲中共中央機關報，以宣傳黨和政府的方針政策爲主要任務，它的版面編輯工作非常重要。大陸幹部與民眾通常通過《人民日報》版面，來瞭解一個時期內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在關鍵時刻，多數大陸報紙甚至要和《人民日報》「對版面」（人民日報編輯部，1997：序；王武錄，2006：前言 1；鍾立群，1997：121；何川，1994：108-109）。這是因爲中共早已形成重要政務新聞由新華社統一發布，並由《人民日報》刊載的傳統（魏永征，2002：198-199）。同時，《人民日報》評論承擔宣傳黨內理論、路線與政府方針、政策的責任，是中央解釋意識型態的載體工具。這種傳達中共理論的權威地位使得《人民日報》成爲黨內派系爭奪的重要場域，《人民日報》負責人往往成爲被攻擊的對象（何川，1994：74-76、206；賈艷敏，2007）。

同時，根據過去例證，《人民日報》負責人應該知道中共高層互動走向。《人民日報》與新華社往往由政治局和書記處直接領導，業務上也受中央宣傳部指導。這兩家新聞機構的總編輯室或主要部門均設有通往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與中共主要領導人辦公室的紅色電話，以便隨時就重大問題向上請示（何川，1994：94）。《人民日報》主要負責人甚至曾經列席政治局常委會會議、政治局會議和中央書記處會議，因而掌握高層決策與互動情形。[18] 一九五〇年代初期中共甚至批准《人民日報》派出高級主管聯繫中央各部門，列席各部委黨組會議和民主黨派、群眾團體的相應會議，以便了解領導意圖，即時報導（李庄，1993：126、188）。即使

[17] 《人民日報》創刊於 1946 年 5 月 15 日，原爲中共晉冀魯豫中央局的機關報。1948 年 5 月中共華北中央局決定原晉察冀邊區的《晉察冀日報》與原晉冀魯豫邊區的《人民日報》合併爲中共華北中央局的機關報《人民日報》。1949 年 8 月，全大陸即將解放，中共需要一份全國性報紙，於是再將中共華北局機關報《人民日報》改爲中共中央機關報。此次改制未作任何聲明，期號也未重新編排（賈艷敏，2007）。

[18] 如 1956 年 3 月起毛澤東指派吳冷西列席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會。吳冷西在其回憶錄中曾多次提及參加上述會議。吳冷西在 1951 年 12 月出任新華社社長，1957 年 6 月毛澤東欽點他擔任《人民日報》總編輯兼新華社社長（吳冷西，1988：2），1964 年 7 月又兼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當時吳冷西列席黨內高層會議，由他撰寫有關中蘇路線爭議的新聞初稿，毛澤東等審閱後再刊載媒體。見吳冷西（1999）。由於《人民日報》未積極配合文化大革命，1966 年毛澤東授意陳伯達奪取吳冷西的社長權力。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經歷傳媒商業化的浪潮，中共仍將《人民日報》等黨報納入公費訂閱的範圍，以保持其純潔度，避免爲了經濟利益而犧牲黨報是「黨的喉舌」的目標（杜耀明，2000：69）。由此來看，《人民日報》刊登的照片理應最能反映中共領導人權力消長。

其次，本文選擇後革命世代領導人之間的權力轉移爲分析個案，使得《人民日報》版面最能顯現領導人權力的消長。一九七八年以後，中共先後經歷真理論戰、胡耀邦下台、八九民運事件、九二南巡等多次權力較勁，甚至造成領導人更迭。不過，本文排除這些革命世代領導人涉入其中的政治危機，而將焦點集中在後革命世代領導人的權力消長。革命世代領導人擁有建國革命功勳，使其在退休後能夠運用「魅力權力」繼續掌握最後決策權，幕前工作則由無實權的第一線領導人擔任。元老政治造成領導人權力、職務無法合一，可能導致版面無法有效反映領導人的實際地位。這種差異可能導致黨報刊登革命世代領導人照片的模式不同於刊登後革命世代領人照片的模式。在後革命世代領導人主政期間，其主要權力來源轉爲職務權力，喪失職務則導致權力快速流失。[19] 權力、職務合一的發展使得領導人在媒體上的曝光情形與其權力地位相符。鄧胡、鄧趙、鄧江間的互動關係均涉及後革命世代領導人，較爲複雜。江胡兩人則均爲後革命世代領導人。二〇〇二年十一月開始，江澤民逐步將交出領導職務，其職務權力也移轉到胡錦濤身上。江澤民雖能保留部分影響力，但其權力已無法和過去相比。正因爲如此，本文更可以凸顯江、胡兩人權力轉移過程中，他們兩人照片在《人民日報》版面上如何隨之變化。

解釋選擇個案的原因之後，本文接著說明個案分析的起迄時間。江、胡兩人權力轉移的過程大致經過五個重要事件，先後分別是：

1. 二〇〇二年十一月中共十六大胡錦濤接任總書記，成爲黨的最高領導人。然而，由於此時江澤民仍擔任軍主席，又掌握「三個代表」的詮釋權與執政十三年累積的豐厚人脈，胡錦濤的權力尚未完全鞏固。

[19] 關於革命世代與後革命世代領導人主要權力來源的差異與影響，詳見寇健文（2006：39-7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 二〇〇三年三月胡錦濤出任國家主席，成爲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對外象徵。國家主席只是虛位元首的職務，但隨著中共國力增強，國際場合曝光機會大增。胡錦濤可以利用出席國際場合，以國家主席身分塑造自己是國家領導人形象。
3. 二〇〇三年四月 SARS 疫情爆發，胡錦濤罷黜衛生部長張文康、北京市長孟學農，震懾中共各級幹部。胡錦濤因原爲江澤民醫療顧問的張文康隱瞞疫情，罷黜其衛生部長職務。胡錦濤的果斷讓高幹心生警惕，不敢不重視新領導人的指令。這是胡錦濤加速鞏固權力的重要里程碑。
4. 二〇〇三年七月胡錦濤發表七一黨慶講話，以自己提出的「三個爲民」——「權爲民所用，情爲民所繫，利爲民所謀」——爲「三個代表」的內涵。胡錦濤因而確定掌握「三個代表」的詮釋權，控制黨的意識形態走向。
5. 二〇〇四年九月胡錦濤接任中央軍委主席。自二〇〇四年起，中共高層出現明顯的分歧現象，胡錦濤支持溫家寶的宏觀調控政策，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則反對，其他上海幫成員對此議題態度不一。七月以後，胡溫和江澤民的分歧分歧轉移到意識形態領域和江澤民地位等議題，超過一般政策歧異的程度。江澤民無意於九月舉行的四中全會交軍委主席，並有意掌握軍權以外領域的主導權。胡溫則力圖鞏固十六大以來的戰果，早日完成鞏固權力的工作。九月一日江澤民提出辭職信，隨後被中委會接受。胡錦濤完成總書記、國家主席、軍委主席「三位一體」的接班過程。[20]

另外，本文選擇二〇〇五年二月二十四日最後一個春節慶祝活動——元宵聯歡——做爲研究時段的終點。[21] 上述六個事件或活動將江、胡兩人

[20] 關於江、胡兩人權力轉移的過程，參見寇健文（2005a：158-185）。

[21] 中共每年固定舉行七個慶祝春節的活動，所有領導人均會親自出席。依照時間排序，這七個慶祝春節活動分別是新年京劇晚會、全國政協新年茶話會、中央軍委慰問駐京老幹部迎新春文藝演出、中共中央舉行黨外人士迎春座談會、軍民迎新春文藝晚會、中共中央國務院春節團拜、中共中央元宵節聯歡晚會。胡錦濤接任軍委主席後，第一個全體領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權力轉移共分成五個時段，其中第五個時段（二〇〇四年九月胡錦濤接掌軍委主席至二〇〇五年二月他出席元宵聯歡晚會）是用來觀察江、胡權力交接完畢後，《人民日報》刊登領導人照片的編輯手法。

二、分析指標：曝光頻率、版面位置與照片構圖

本文觀察《人民日報》編輯手法時，是從胡、江兩人照片在該報頭版的曝光頻率、版面位置、照片構圖三個面向著手。[22] 曝光頻率計算江、胡兩人照片在《人民日報》出現的頻率，用以觀察在權力轉移過程中，誰的照片最容易被刊登出來。版面位置著重江、胡兩人（但非合照）的照片分別佔據頭版的何種位置，藉以觀察在不同時段中，兩人照片被安置在什麼版面位置上。照片構圖則聚焦於江、胡兩人合照的照片，[23] 分析在不同時段內何人佔據照片中的優勢位置。接下來，本文分別從這三個面向討論之。

㈠曝光頻率

曝光頻率是指領導人在《人民日報》頭版新聞照片中出現的頻率。本文以月爲單位，從二〇〇二年十一月到二〇〇五年二月，共有 28 個月。[24] 凡是出現一次胡錦濤或是江澤民的照片都計算爲該領導人的積分一分。若爲江、胡兩人的合照照片，兩人各得積分一分。兩人每個月各得一個積分數值，因而獲得江、胡照片在這段期間的頻率走勢。根據本文的論點，江澤民照片出現頻率應呈現減少趨勢，反之胡錦濤的照片頻率則上揚。這個部分僅討論江、胡兩人照片的曝光頻率，至於兩人照片佔據的版面位置，以及兩人在合照照片中的位置則留在版面積分與照片構圖部分再討論。

導人親自出席的大型官式活動即爲新年京劇晚會。這些活動雖爲娛樂性活動，卻因領導人慣例上都會現身，成爲重要場合。

[22] 按中共的習慣，政治局常委等級領導人的照片多半刊登於黨報第一版，極少出現在第二版以後的各版次。因此本文省略江、胡兩人在第二版以後的照片將不會影響研究結果。

[23] 在本文中，合照照片特指該照片包含江澤民和胡錦濤兩人。但照片中可能還有許多其他人物，並非只侷限他們兩人。

[24] 唯因分析時段從 2002 年 11 月 16 日至 2005 年 2 月 24 日結束，故 2002 年 11 月與 2005 年 2 月這兩個時段的分析天數與其他月份不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㈡版面位置

版面位置是指照片在《人民日報》頭版佔據的版面位置。不論是中文報紙或是外文報紙，均可依據讀者的閱讀動線，區分出數個重要性不等的區塊（Gilmore, 1983: 92；鍾立群，1997：412-415）。不過，學者們對於各區塊優先順序的看法並不完全一致。舉例來說，吉爾默（John Gilmore）認爲「由左往右」的閱讀習慣導致視覺動線從報紙左上方往右上方移動，接著順著右上方往下移動到達右下方，再移往左下方，最後到達報紙中央處。如果報頭（nameplate）右側爲報眼的位置，視覺動線在看到報頭後就會先移至報眼，報眼因而躍升爲最重要的版面區塊（Gilmore, 1983: 92-93）。鍾立群則將版面分爲四分區（左右兩排，上下兩列，共四個區塊）、六分區（左右兩排，上中下三列，共六個區塊）以及九分區（左中右三排，上中下三列，共九個區塊）。在四分區的版面安排中，讀者的視覺是「從左而右，由上到下」，形成 Z 字型的動線。在六分區和九分區的版面位置中，讀者的視覺動線是「從左而右，由上列而直接跳到下列，最後移到中列」（鍾立群，1997：413）。

由於本文分析《人民日報》的新聞照片，而鍾立群曾任《人民日報》第一版編輯長達二十多年，因此本文版面區塊的劃分係以鍾立群的觀點爲主。在鍾立群的四分區、六分區、九分區等三種分法中，本文採用六分區做爲分析照片版面位置的基礎（見圖 1）。《人民日報》頭版版面呈長 49 公分×寬 35 公分的矩形，照片多半以塊狀（正方形或長方形）在版面出現。若採用四分區的版面劃分法，很容易造成兩張照片都在同一區塊當中，失去比對江、胡兩人照片競爭版面區塊的意義。另外，由於照片本身具有一定的面積，若採用九分區的版面劃分法，又可能導致一張照片橫跨兩區，造成分析上困擾。

然而，版面六分區的劃分法仍有需要補充的地方。《人民日報》報頭只佔據整個版面最左上角的位置，右上角因而出現報眼。報頭和報眼的位置自成一格，在頭版最上端的位置。由於報頭位置必定刊登報紙名稱，刊登在報眼的新聞就佔據頭版全版的最佳位置（鍾立群，1997：426）。

據此，本文將《人民日報》頭版依照重要性分成七個版面區塊，分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標示甲、乙、丙、丁、戊、己、庚等七個區塊，並給予積分，依序爲 7 分、6 分、5 分、4 分、3 分、2 分、1 分。（見圖 1）接著，本文以月爲單位，計算出江、胡二人的照片分別或同時出現（但非合照照片）在《人民日報》頭版時，各得到幾分。兩人合照照片佔據在版面的單一位置，無積分差異，因此不予計算。據此，本文分別獲得江、胡照片在版面位置的優劣走勢，觀察《人民日報》如何逐漸改變其編輯手法，以符合中央領導人權力的消長。根據本文的論點，江澤民照片的版面位置應該逐漸落居下風，胡錦濤照片的版面位置則逐漸佔據上風。

圖 1　版面區塊、優劣順序與積分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㈢照片構圖

照片構圖側重分析《人民日報》是否偏好採用以江澤民（或胡錦濤）爲主體人物（佔據照片中的優勢位置）的兩人合照照片，進而反映江、胡兩人權力的消長。攝影凸顯主體地位的方法不外乎將主體安排在視覺動線的顯著位置，或是利用對比技巧使主體凸顯於其他客體。眼睛欣賞照片時，視線首先落在照片中央的位置（李友之，1982：87）。一張照片中若有許多物體時，越靠近照片中央的位置，越具有吸引力，越具備成爲主體的條件（李坤山，1995：67）。另外，Geraci 根據 Gaffron 提出的「視覺曲線」（glance curve），引申認爲佔據圖片左邊的物體重要性要比右邊的高（Geraci, 1984: 193）。[25] 除了主、客體位置的安排之外，對比技巧是另一種彰顯照片主體地位的方式，常見的對比技巧如大小對比、明暗對比、色彩對比等（李坤山，1995：69）。換言之，在照片構圖中主體必定是佔據較大空間、被放在亮處、影像清晰、置於中央或左半邊位置。

根據上述原則，本文依照下列四項標準定義照片中的主體人物：

第一、臉部輪廓——臉部輪廓與表情清晰是成爲主體人物的必備條件。任何臉部輪廓和表情不清晰的人物都只是照片的背景，背對鏡頭、側面面對鏡頭的人物也只是配角人物。

第二、相對位置——主體人物必須居於照片的中央段落（當照片中人物超過兩人時）或是左半邊（當照片中僅兩人時）。在超過兩人以上的合照中，即使臉部輪廓清楚，但身處兩側位置的人物，只是配角人物。在兩個人的合照中（即只有江澤民與胡錦濤兩人的合照），居於照片左半邊的人物則是照片主體，右半邊的人物則是配角。

第三、影像對比——照片中主體人物的影像不小於配角人物，或位於其他人物的前方。這是攝影者利用大小對比或前後差距襯托出照片的主體。人物影像較小、位於後面的人物因此成爲配角。

第四、照片人數——照片中的人物過多，即使特定人物臉部輪廓清晰、

[25] 1950 年 Gaffron 提出視覺曲線（glance curve）的觀點，意指當人類在觀看照片時的視覺動線是從左下方開始漸往右上方移動，呈現對角線的移動路徑（Geraci, 1984: 19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位居照片中間區段，仍會分散讀者注意力。因此，有主體人物的照片不應包括過多人物。《人民日報》刊登的新聞照片時常出現多人入鏡的大合照照片，有時人物高達 50 人以上。即使照片中人物臉部表情尚稱清晰，這些多人入鏡的大合照照片旨在告知讀者相關活動訊息，未以江澤民或胡錦濤爲主體。[26] 爲求分析便利，本文界定距離鏡頭最近一排（通常是大合照中的最前排，也是江、胡兩人所在位置）人物超過 10 人以上時，就算人數過多。這種多人入鏡的大合照屬於無主體人物的照片。

根據這四個標準，本文把包含江、胡兩人的照片分成⑴無主體人物；⑵江澤民單獨爲主體人物；⑶胡錦濤單獨爲主體人物；⑷江澤民、胡錦濤同爲主體人物。其中江、胡兩人同爲主體人物的情形僅可能出現在多人合照的照片。此時與江、胡兩人站在同一排的人數是偶數，他們兩人共同佔據照片的中間位置。

肆、實證分析

說明完研究設計之後，本文從照片曝光頻率、版面位置與照片構圖三項指標，分析二〇〇二年十一月到二〇〇五年二月之間《人民日報》刊登的江澤民、胡錦濤照片，以便說明領導人權力消長與黨報編輯手法變化的關聯性。

一、江澤民、胡錦濤照片的曝光頻率

在本文分析的全部時段內，一共找到 515 張照片。其中出現胡錦濤的照片有 397 張，出現江澤民的照片 80 張，兩人都出現的照片 38 張。統計結果發現，江澤民與胡錦濤照片曝光頻率以二〇〇三年四月爲分水嶺。二〇〇二年十一月胡錦濤接任總書記之後，他的曝光頻率在次月起立刻增加，直追江澤民。二〇〇三年三月兩人交接國家主席以前，江澤民、胡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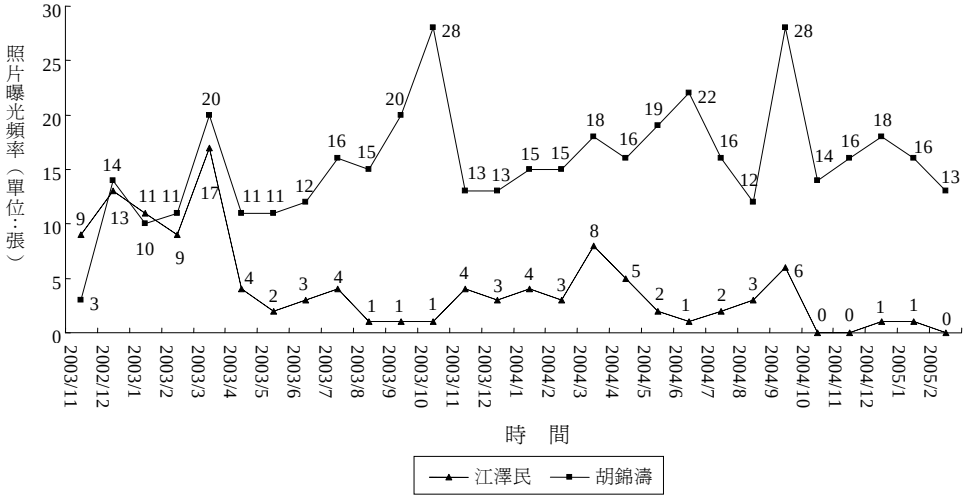
[26] 聯合報編輯部總編輯特別助理、政大新聞系兼任講師溫禾表示，在台灣等自由競爭導向的報業市場上，很少使用 10 人以上的大合照。因爲那些連人物臉部都看不清楚的照片無法吸引讀者，對報社來說並不具有新聞性。2007 年 10 月 9 日訪談。依照這個觀點，這些多人入鏡的合照並未凸顯照片中特定人物的主體性，而是以整個活動爲主體。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濤的曝光頻率互有領先，但差距一般都不大。但在二〇〇三年四月以後，胡錦濤照片的曝光頻率明顯而且穩定地高於江澤民。（見圖 2）等到二〇〇四年九月江澤民交出軍委主席一職後，他的照片曝光頻率滑落到幾近於零。《人民日報》只在二〇〇四年十二月新年京劇晚會與二〇〇五年一月宋任窮喪禮等兩個新聞中，刊登包含江澤民的照片。相反的，胡錦濤照片的曝光率穩定的維持在 11 次到 20 次之間，甚至有一個月之內出現 29 次的紀錄。

由於二〇〇三年三月、四月正逢江澤民交出軍委主席、中共公開 SARS 嚴重疫情兩件大事，本文進一步分析這兩個月的數據，以便藉此瞭解這兩件事件如何影響胡、江兩人的曝光率。《人民日報》在三月十六日刊登前一天胡錦濤接任國家主席的照片，在四月十三日首次使用「非典型肺炎」（SARS）一詞，並在四月二十日政治局常委會決議罷黜北京市長孟學農、衛生部長張文康兩人的黨職，隨後解除他們的政府職務。基於這段史實，本文以三月十六日和四月十三日爲分隔點，將三月和四月各自再細分爲兩個時段，以便對照江澤民、胡錦濤兩人照片數量比值的變化（見表 1）。

圖 2　江澤民、胡錦濤照片的曝光頻率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 1　二〇〇三年三月、四月胡錦濤與江澤民照片的曝光頻率

		三月前期（3/1-3/15）	三月後期（3/16-3/31）	四月前期（4/1-4/12）	四月後期（4/13-4/30）
照片張數	胡錦濤	12	8	3	8
	江澤民	12	5	3	1
	比　例	1：1	1.6：1	1：1	8：1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結果發現，在胡錦濤接任國家主席與中共公開 SARS 疫情之間（三月後期至四月前期），《人民日報》的編輯手法並未改變，胡、江兩人照片的比值維持在 1.6：1 或 1：1。照理說，胡錦濤接任國家主席之後，應該會增加許多以中國元首身分接見外賓的機會，使他的曝光率明顯超過江澤民。然而，在這段期間，江澤民繼續接見外賓來訪或出席官式對外活動，維持一定的曝光率，例如三月二十日會見塔吉克斯坦總統、三月二十六日會見巴基斯坦總理、四月四日接見曾任法國總統的歐洲制憲委委員會主席季斯卡（Valéry Giscard d'Estaing）、四月四日參加植樹活動、四月九日會見越共總書記農德孟（Nong Duc Manh）等等。中共 SARS 疫情公佈之後，胡錦濤照片的數量才明顯超過江澤民。四月後期胡錦濤的照片數量與前三個時期的平均值相近，但江澤民的照片數量卻進一步遞減。

綜合上述所言，三月十六日胡錦濤接任國家主席至四月十三日中共公佈 SARS 疫情之間，胡錦濤與江澤民兩人的照片比例均維持著相對穩定的數值。但公佈 SARS 疫情之後，兩人照片比值出現明顯變化。這是造成四月份兩人照片出現大幅落差的主因。同時，SARS 疫情被控制之後，江澤民照片也不再頻頻出現。對照胡錦濤、江澤民兩人權力轉移過程，這段期間正是胡錦濤罷黜張文康、孟學農兩人，以果敢手段遏制 SARS 疫情的階段。經過了這個危機以後，胡錦濤已經證明他有能力帶領中國克服危機，再也沒有人認爲胡錦濤是「兒皇帝」了。由此可見，從照片曝光頻率的指標來看，《人民日報》處理胡錦濤、江澤民兩人照片的編輯手法，確實勾勒出領導人權力實際消長的過程。領導職務交接固然會影響江、胡兩人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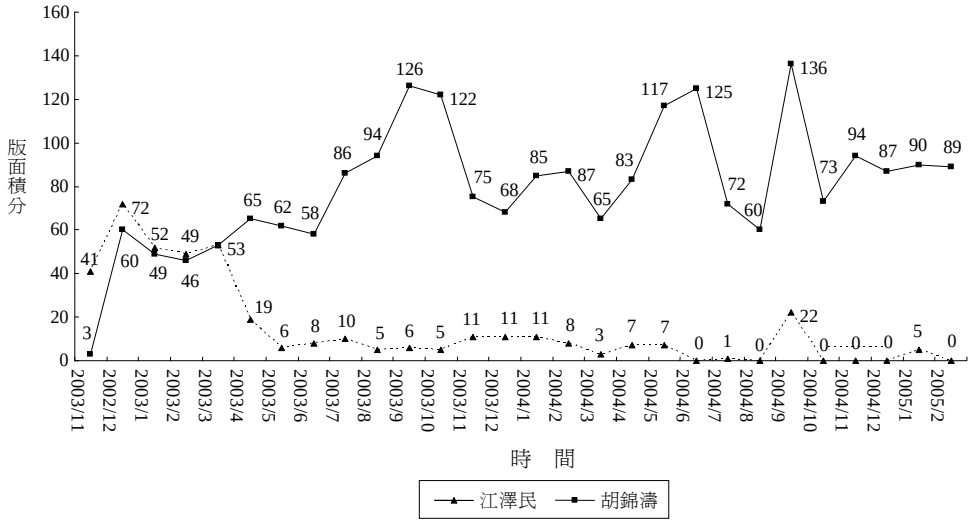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片被刊登的曝光頻率，但其他造成領導人權力消長的事件也影響兩人照片曝光頻率。

二、江澤民、胡錦濤照片的版面積分

接下來，本文分析江、胡兩人照片（兩人合照除外）在版面積分指標上的變化。結果發現，江澤民與胡錦濤照片的版面積分又是二〇〇三年四月爲分水嶺。胡錦濤在二〇〇二年十一月就任總書記，從次月起胡錦濤照片的版面積分迅速攀升，但始終略低於江澤民照片的版面積分。即使在胡錦濤接任國家主席之後，這個現象也沒有改變。但在二〇〇三年四月以後，胡錦濤照片的版面積分幾乎都維持在 60 分以上，甚至有五個月超過 100 分以上，明顯而且穩定地高過江澤民照片的版面積分。江澤民照片的版面積分除了在中委會開會（二〇〇四年九月）期間略有攀升之外，其餘都是低檔徘徊，無法回到 SARS 疫情爆發之前的光景（見圖 3）。等到二〇〇四年九月軍委主席交接之後，江澤民照片的版面積分幾乎都是 0 分。這再度顯示《人民日報》的編輯手法在二〇〇三年四月出現重大轉折。

圖 3　江澤民、胡錦濤照片的版面積分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接著本文重複曝光頻率部分的作法，將二〇〇三年三月、四月分成四個時段，以便觀察兩人照片版面積分出現變化的關鍵。在國家主席交接之前（三月前期），國家主席江澤民的版面積分高於身爲總書記的胡錦濤（見表 2）。由於本文前面已經指出兩人曝光頻率的比值是 1：1，這顯示江澤民照片佔據的版位置遠遠優於胡錦濤照片。在國家主席交接至中共公佈 SARS 嚴重疫情之間，儘管胡錦濤照片的版面積分曾有領先，但江澤民照片仍佔據重要的版面位置。江澤民甚至以軍委主席的身份接見文職外賓（季斯卡），並與胡錦濤先後會見友好國家的黨務領導人（農德孟）。總體來看，在整個三月和四月前期之間，江、胡兩人照片的版面積分在《人民日報》上維持互有領先的現象。這種現象在四月十三日《人民日報》首度承認 SARS 疫情失控之後出現顯著變化。胡錦濤照片的版面積分在四月後期躍升到 53 分，是江澤民照片的 7.6 倍。這種差距符合二〇〇三年五月以後的趨勢。

表 2　二〇〇三年三月、四月胡錦濤與江澤民照片的版面積分

		三月前期（3/1-3/15）	三月後期（3/16-3/31）	四月前期（4/1-4/12）	四月後期（4/13-4/30）
照片張數	胡錦濤	30	23	12	53
	江澤民	42	11	12	7
	比　例	0.7：1	2.1：1	1：1	7.6：1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總結上述發現，接任國家主席使得胡錦濤照片的版面積分增加，但在 SARS 疫情公佈之前，江澤民照片在版面上佔有重要位置，甚至優於前者。由此可見，國家主席交接一事不是造成兩人版面積分變化的唯一主因。另一個重要因素是 SARS 疫情導致兩人權力明顯消長。胡錦濤率領中共新領導班子，罷黜孟學農、張文康兩人，同時展現自己的治國能力。最後不但順利結束 SARS 危機，同時鞏固自身的領導地位。這種地位消長反映在《人民日報》編輯手法的改變。

由於江澤民當時爲軍委主席，本文扼要說明《解放軍報》編輯手法出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現的一些特別現象。二〇〇二年十六大之後，《解放軍報》頭版在「同時」刊登這兩位領導人照片時，一定是凸出江澤民的地位，如在報頭正下方位置刊登凸顯江澤民爲主體人物的照片，他的照片也會佔據版面優勢位置。胡錦濤照片放在較劣勢的位置，常常是多人合照的照片，而且說明文字只提到他的軍委副主席職務，不提總書記和國家主席頭銜。[27]

這種編輯手法在二〇〇四年九月一日首度出現變化。當日《解放軍報》把胡錦濤照片放在報頭正下方的版面位置，把江澤民照片放到較劣勢的同排中間位置。照片的說明文字也以總書記和國家主席稱呼胡錦濤，不提他的軍委副主席身分。這使得胡錦濤的照片名正言順排在軍委主席江澤民照片的左側。九月三日《解放軍報》再度出現類似情形。同月二十日十六屆四中全會同意江澤民辭去軍委主席職務後的第二天，《解放軍報》又是如此。事後資料顯示，九月一日正是江澤民簽署辭職信的那一天（江澤民，2004）。在九月初兩度把胡錦濤照片放在優於江澤民照片的版面位置，改變之前的編輯手法，正好呼應江澤民提出辭職信的時間點。

九月二十一日《解放軍報》刊登江澤民、胡錦濤兩人出席軍委擴大會議的照片時，把江澤民的照片放在較優勢的版面，胡錦濤照片則在較劣勢的位置。不過，此時應該只是禮貌性作法，而非代表兩人權力再度出現變化。因爲在軍委擴大會議上，江澤民指出胡錦濤是合格的軍委主席，又說總書記、國家主席、軍主席三位一體是必要的、最妥當的作法（江澤民，2004）。

三、江澤民、胡錦濤的照片構圖

最後，本文再從照片構圖的面向說明江、胡兩人權力消長如何影響他們在合照中的位置。在本文的研究時段中，江澤民與胡錦濤兩人共同出現的照片有 38 張，比例僅佔全部 515 張照片的 7.4%。照片張數過少使得些微的張數增減導致高百分比的差異，這是以合照照片觀察兩人權力消長時，

[27] 參見 2004 年 7 月 27 日《解放軍報》頭版版面。這是在十六屆四中全會開幕以前，《解放軍報》最後一次把江澤民照片放在優於胡錦濤照片的版面位置上。本段和下一段提到的《解放軍報》頭版版面變化，都可直接檢閱當日《解放軍報》，不再附加註釋說明。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面臨的最大隱憂。在這 38 張合照照片中，15 張是與解放軍將領合照，除江澤民、胡錦濤以外無其他任何一位文人。在這些軍方場合的照片中，14 張是在軍委主席交接前拍攝，照片旁白文字均只說明胡錦濤以軍委副主席身分出席，並未提及他的中共總書記、國家主席身分。江澤民則以軍委主席身分出現。另有 8 張是在節慶表演或植樹活動時拍攝。這兩種場合拍攝的合照佔全部合照照片的六成。

分析結果發現，合照片張數雖然很少，但仍能看出領導人權力地位改變對《人民日報》編輯手法的影響。照片構圖所呈現的特徵與曝光頻率、版面積分大體相近。這種變化的趨勢有四點特徵：一、二〇〇三年四月仍然是江、胡兩人合照中主體人物改變的重要分水嶺；二、單獨以江澤民爲主體的合照照片明顯減少；三、以江澤民、胡錦濤兩人爲共同主體的合照則明顯增加；四、單獨以胡錦濤爲主體的合照照片在最後階段開始出現（見表 3）。

表 3　江、胡兩人在合照中的主體位置

	2002/11-2003/2	2003/3	2003/4-2003/6	2003/7-2004/8	2004/9-2005/2
共同主體	17% (1 張)	14% (1 張)	33% (1 張)	35% (7 張)	50% (1 張)
江 主 體	50% (3 張)	86% (6 張)	33% (1 張)	25% (5 張)	0% (0 張)
胡 主 體	0% (0 張)	0% (0 張)	0% (0 張)	0% (0 張)	50% (1 張)
無 主 體	33% (2 張)	0% (0 張)	33% (1 張)	40% (8 張)	0% (0 張)
合　　計	100% (6 張)	100% (7 張)	99% (3 張)	100% (20 張)	100% (2 張)

註：由於四捨五入的關係，各項比例加總可能不等於 100%。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在二〇〇二年十一月至二〇〇三年三月之間，單獨以江澤民爲主體的合照照片均佔該時段 50% 以上。二〇〇三年四月以後，江澤民爲主體的合照照片明顯減少，等到二〇〇四年九月他交出軍委主席後，《人民日報》甚至不再刊登這種合照照片。由此可見，單獨以江澤民爲主體人物的合照照片明顯減少。相對的，以江澤民、胡錦濤兩人爲共同主體人物的合照明顯增加。在二〇〇三年三月以前，把江、胡兩人置於合照中央位置的比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各有 1 張，比例低於 20%。等到二〇〇三年四月以後，江、胡是共同主體人物的比例升高到三分之一以上，最後甚至高達 50%。同時，二〇〇四年九月在軍委主席交接之後，《人民日報》開始刊登單獨以胡錦濤爲主體人物的合照照片，爲前幾個時段從未出現的情形。

四、對照個案：領導人權力未發生消長時的黨報編輯模式

本文第二節討論領導人權力消長與黨報新聞照片的關係時，曾經指出中共領導班子出現權力消長時，黨報的編輯手法容易出現混亂的情形。領導人之間若未發生權力消長的時候，黨報刊登領導人新聞照片的原則應該符合領導人各自的身分，呈現穩定的模式。爲了觀察是否出現「選擇偏差」（selection bias）的問題，[28] 本文以今年五月四川地震之後（五月十三日至六月四日之間），《人民日報》頭版刊登胡錦濤與溫家寶兩人照片爲例，簡單說明領導人之間既無路線紛爭，亦無地位消長的情況下，《人民日報》刊登領導人照片的模式。換言之，四川地震個案可說是江胡權力轉移個案的對照個案。

溫家寶在地震之後擔任國務院抗震救災總指揮部總指揮，立即前往四川賑災，曝光機會大增，並贏得眾人好評。照理說，他的照片出現在《人民日報》頭版的機會應該很多。然而，本文發現，在這 23 天中，《人民日報》並未改變刊登胡溫兩人照片的原則。胡錦濤的照片數量壓倒性的超過溫家寶的照片數量。胡錦濤照片共出現 18 張（其中 4 張照片爲接見外賓，另外 14 張照片則是探視災民與慰問救災人員），溫家寶照片只出現 4 張。另外，還有一張是全體政治局委員哀悼災民的大合照。從曝光頻率來看，胡錦濤照片遠遠超過溫家寶照片完全符合兩人的權位順序。由於胡溫兩人照片的曝光頻率相差甚多，胡錦濤照片的版面績分自遠高於溫家寶，也符合兩人的權位順序。

此外，溫家寶四張照片中的三張密集出現於地震剛發生後的三天——五月十三日至十五日。胡錦濤於五月十六日前往四川探災後，《人民日報》

[28] 關於選擇偏差的討論，參見 Geddes (2003: 89-129)；King et al. (1994: 124-149)；Collier (199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頭版只刊登過一張以溫家寶爲主體的照片。這張照片出現在五月二十三日，當日胡錦濤的照片也出現在。胡錦濤照片位於本文所訂版面區塊的丙區，而溫家寶照片則在戊區。從版面位置來看，胡錦濤照片的位置優於溫家寶照片的位置，依舊符合兩人的權位順序，並未因四川地震而變化。由此可見，當領導人地位未曾出現消長時，黨報的編輯手法不會出現變化。

伍、結　論

對於研究中共菁英政治的人來說，如何找到更多訊息管道，協助判斷高層領導人權力消長，始終是一個嚴酷的挑戰。在過去學者研究基礎上，本文指出黨報刊登領導人新聞照片的編輯手法，會因領導人權力消長而變化。造成這種因果關係的原因則是黨報的「黨性原則」——黨報與中共中央的路線、方針和政策保持一致。本文因而得出一個論點——「領導人權力的消長導致黨報刊登領導人照片的編輯手法出現變化」。爲了闡述上述觀點，本文從曝光頻率、版面位置與照片構圖三個面向分析《人民日報》的編輯手法，檢驗該報刊登江澤民、胡錦濤照片的策略如何隨著兩人權力轉移的進程而調整。

研究結果發現，在二〇〇二年十一月至二〇〇五年二月之間，《人民日報》的編輯手法以二〇〇三年四月 SARS 危機爲重要分水嶺，呈現兩種不同的模式。二〇〇二年十一月胡錦濤接任總書記之後，他的照片在曝光頻率與版面優劣位置上明顯提升許多，但仍與江澤民照片呈現互有領先的膠著局面。在 SARS 危機爆發之後，胡錦濤照片在這兩個面向明顯甩開江澤民照片，居於領先地位。

在照片構圖上，《人民日報》的編輯手法主要是以二〇〇三年四月 SARS 危機爲重要分水嶺。SARS 危機之前，單獨以江澤民爲主體人物的合照照片高達 50%，之後就明顯逐漸減少，以致於完全消失。相對的，以江澤民、胡錦濤兩人爲共同主體的合照則從 SARS 危機之前的一成多增加到 SARS 危機之後的三分之一。在二〇〇四年九月，《人民日報》更首度使用單獨以胡錦濤爲主體人物的合照照片。不過，合照照片張數過少，平均一個月 1.5 張，使得些微的張數增減導致百分比的大幅差異。這是以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照照片觀察兩人權力消長時，必須非常慎重的地方。

本文認爲《人民日報》編輯手法改變的過程不僅受到領導人職務交接的影響，也會受到領導人建立統治威信的影響。爲了確認後者對《人民日報》編輯手法的影響，本文特別將二〇〇三年三月、四月各細分爲兩個時段，以便觀察該報在國家主席交接至 SARS 疫情爆發之間的刊登江、胡兩人照片的情形。結果發現《人民日報》在這段期間的編輯手法與國家主席交接以前的策略相似，去和 SARS 疫情爆發之後的模式顯著不同。換言之，總書記、國家主席、軍委主席等三個職務交接事件強化胡錦濤的地位，使得《人民日報》增加刊登胡錦濤照片的頻率、較常把胡錦濤照片放在版面的優勢位置。然而，胡錦濤解決 SARS 危機的後續影響也不容忽視。這個危機並未導致領導人異動，但給予胡錦濤罷免兩位正部級高官，建立統治威信的機會。《人民日報》因而進一步調整編輯手法，凸出新任領導人。

雖然本次研究結果尚稱滿意，但不能因此過度膨脹它的意義。首先，本文的研究設計屬於「典型個案分析」，刻意挑選最適合、最具代表性的個案，藉此使此論點得到經驗上的支持。若要建立真正的、更細緻的通則，就需要更多的個案研究來累積成果，如激烈政爭過程中黨報刊登領導人照片的模式等等。本文在說明研究設計時已經點出這個侷限性。

其次，外界可以在較長的一段時期內，從黨報刊載的眾多領導人照片中，勾勒他們權力消長的趨勢，但未必能判斷特定時間點黨報刊載個別照片的政治意涵。造成黨報刊載不符合領導人權力消長實況的個別照片可能有很多原因。例如尊重屆退領導人的禮貌性作法、[29] 編輯人員自由意志抗拒中央指令、[30] 激烈派系鬥爭導致高層分裂，或是領導人權力急速變化等等，[31] 都可能導致各別照片無法反映領導人真正的政治地位。若以個別照片判斷領導人權力消長，可能有造成誤解的風險。這就好像統計學者以單

[29] 本文前面提到，2004 年 9 月 21 日《解放軍報》頭版版面把江澤民的照片放在較優勢的版面，胡錦濤照片則在較劣勢的位置。

[30] 自由意志出現後，若中共政治體制未瓦解，相關新聞人員隨即會遭到處分，使得黨報的黨性重現。當大陸內部爆發像六四事件的危機時，比較可能出現這種情形。

[31] 高層嚴重分裂時，有可能出現主要派系各擁報紙對陣攻訐，或是同一報紙編輯手法出現前後不一的混亂現象，也有可能爲了維持領導班子團結假象而出現的假照片。本文討論新聞攝影時曾經指出有關後者的例子。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樣本推估母體時可能出現的問題一樣。

參考書目

一、中文部分

丁柏銓、丁和根、董秦，2006，《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新聞思想研究》，北京：新華出版社。

人民日報編輯部編，1997，《人民日報版面備要》，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

大陸新聞中心，2004，〈珍貴史料作手腳，胡江權鬥熱猜疑〉，聯合報，9/4，A1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2004，《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

王武錄（編），2006，《十四大以來《人民日報》版面研究》，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

王　雄，2002，《新聞輿論研究》，北京：新華出版社。

本刊評論員，1993/5，〈認清目標，把握方向——談新形勢下的新聞改革〉，《新聞戰線》，1993(5): 3-4。

本書編寫組，2002，《黨政幹部紀律手冊》，北京：中國方正出版社。

甘惜分，1980，〈什麼是新聞——關於新聞的定義〉，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編），《新聞學論集第一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頁 11-36。

田　鏡，2004，〈誰動了鄧小平胡錦濤的合照？〉，亞洲時報在線（中文版），http://www.asiatimes-chinese.com/2004/08/0830rep2.htm。

石麗東，2003，《當代新聞報導》，台北：正中書局。

列　寧，1995，《列寧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第三版）。

安　岡，1982，《新聞論集》，天津：人民出版社。

江澤民，2004，〈江澤民請辭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信〉，《新華網》，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newscenter/2004-09/19/content_1995365.htm。

江澤民，2004，〈江澤民胡錦濤出席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解放軍報》，http://www.pladaily.com.cn/gb/pladaily/2004/09/21/20040921001130_jryw.html。

何　川，1994，《中共新聞制度剖析》，台北：正中書局。

何清漣，2006，《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策略大揭密》，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吳冷西，1988，〈『五不怕』及其他——回憶毛主席的幾次談話〉，人民日報報史編輯組（編），《人民日報回憶錄》，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頁 1-10。

吳冷西，1999，《十年論戰：1956-1966 中蘇關係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

李友之，1982，《實用攝影技巧》，台北：文化圖書公司。

李　庄，1993，《人民日報風雨四十年》，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

李良榮，1992，《中國報紙的理論與實踐》，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李良榮，2006，〈論中國新聞媒體的雙軌制－再論中國新聞媒體的雙重性〉，人民網，http://media.people.com.cn/BIG5/22100/67945/67946/4599352.html 、 http://media.people.com.cn/BIG5/4599369.html、http://media.people.com.cn/BIG5/4599370.html。

李坤山，1995，〈攝影技巧的表現〉，台北市教師研習中心（編），《藝術攝影教材》，台北：台北市教師研習中心，頁 51-70。

李瑞峰，1983，〈對新聞攝影一些基本問題的認識〉，新華社新聞研究部（編），《新聞論叢》，北京：新華出版社，頁 53-65。

杜修賢、顧保孜，1998，《紅鏡頭——中南海攝影師眼中的國事風雲》，瀋陽：遼寧人民版社。

杜修賢、顧保孜編著，2004a，《紅鏡頭中的周恩來》，瀋陽：遼寧人民版社。

杜修賢、顧保孜編著，2004b，《紅鏡頭中的毛澤東》，瀋陽：遼寧人民版社。

杜耀明，2000，〈從政治機關到經濟企業——中國政治經濟變遷與傳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媒商業化〉，王耀宗（編），《神州五十年：香港的視野》，H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林 楓，1991，〈評胡績偉黨報的黨性和人民性的問題〉，中國社會科學新聞研究所（編），《中國新聞年鑑》，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頁 107-112。

胡績偉，1988，〈平生贏得豪氣在——懷念鄧拓同志〉，人民日報報史編輯組（編），《人民日報回憶錄》，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頁 273-282（第二版）。

胡績偉，1998，《從華國鋒下台到胡耀邦下台》，第 2 版，香港：明鏡出版社。

徐光春，1992〈正確的輿論導向從何而來——北京分社反對動亂報導的基本經驗〉，新華社新聞研究所（編），《新聞改革十年回顧與展望》，北京：新華出版社，頁 27-38。

郝 雨、王豔玲，2003，《新聞學概論》，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

寇健文，2005a，《中共政治菁英政治的演變：制度化與權力轉移 1978-2004》，台北：五南出版社。

寇健文，2005b，〈中共菁英政治與質性分析：原始資料與分析方法〉，《台灣政治學刊》，9(2): 233-279。

寇健文，2006，〈中共與蘇共高層政治演變的軌跡、動力與影響〉，《問題與研究》，45(3): 39-75。

寇健文、鄭兆祐，2006，〈黨報版面語言和中共高層互動——以《人民日報》、《解放軍日報》爲例〉，《政治學報》，42: 37-78。

崔 奇，1988，〈高瞻遠矚，無微不至——回憶周總理對人民日報國際宣傳的關懷與指導〉，人民日報報史編輯組（編），《人民日報回憶錄》，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頁 11-27。

張裕亮，2006，《變遷中的中國大陸報業制度圖像》，台北：晶典文化出版社。

陳力丹，1988，《新聞學小詞典》，北京：中國新聞出版社。

陳永發，2001，《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台北：聯經出版公司。

陳向明，2004，《社會科學質的研究》，台北：五南出版社。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陳懷林，2000，〈試析中國媒體制度的漸進改革——以報業爲案例〉，《新聞學研究》，62: 97-118。

楊開煌，1988，《中共『文件』詮釋之方法學探討》，台北：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論文。

楊繼繩，2004，《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香港：Excellent Culture Press。

葉世濤，1992，〈自覺依靠黨委，當好黨的喉舌〉，新華社新聞研究所（編），《新聞改革十年回顧與展望》，北京：新華出版社，頁 46-55。

賈艷敏，2007，〈二十世紀 50、60 年代毛澤東對《人民日報》的幾次批評〉，《二十一世紀》網絡版，http://www.cuhk.edu.hk/ics/21c/supplem/essay/0702016.htm。

熊昌義，1992，〈周恩來國際報導思想出探〉，新華社新聞研究所（編），《新聞改革十年回顧與展望》，北京：新華出版社，頁 160-167。

劉雲萊，1993，《新聞攝影概論》，北京：新華出版社。

鄧小平，1983，《鄧小平文選 1975-1982》，北京：人民出版社。

蕭緒珊，1980，〈談新聞攝影的真實性〉，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新聞學論集》編輯組（編），《新聞學論集》第 1 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頁 69-83。

戴邦、錢辛波、盧忠民（編），1984，《新聞學基本知識講座》，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

鍾立群，1997，《新聞編輯學研究》，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

魏永征，2002，《新聞傳播法教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顧保孜，1994，《鏡頭下的中南海》，台北：風雲時代出版公司。

二、英文部分

Berner, R. T. 1991. *The Process of Editing*. Boston: Allyn and Bacon.

Cheong, C. 2004. “Hu photo riddle points to power struggle.” *The Straits Times*. Sep (3): 5.

Collier, D. 1996. “Insights and Pitfalls: Selection Bias in Qualitativ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Research." *World Politics* 49(1): 56-91.

Conquest, R. 1961. *Power and Police in the U.S.S.R.*. London: Macmillan.

Copperud, R. H. and R. P. Nelson. 1983. *Editing the News*. Dubuque: Wm. C. Brown Company Publishers.

Eckstein, H. 1975. "Case Study and Theory in Political Science." In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VII): Strategies of Inquiry*, ed. Fred I. Greenstein and Nelson W. Polsby. Menlo Park, California: Addison-Wesley, 79-137.

Geddes, B. 2003. *Paradigms and Sand Castles: Theory Building and Research Design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Geraci, P. C.. 1984. *Photo-Journalism: New Images in Visual Communication* (3rd ed.). Dubuque: Kendall / Hunt Publishing Company.

Gerring, J. 2001. *Social Science Methodology: A Criterial Framework*.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ilmore, G. 1983. *Modern Newspaper Editing*. Modern Newspaper Editing (3rd ed.). San Francisco: Boyd&Fraser Publishing Company.

Goldman, M. 1994. "The Role of the Press in Post-Mao Political Struggles." In *China's Media, Media's China*, ed. Chin Chun Lee. Boulder: Westview Press, 23-35.

Hachten, W. A. and J. F. Scotton. 2002. *The World News Prism: Global Media in an era of Terrorism*. Iowa: Balckwell Publishing.

Hassid, J. 2008. "Controlling the Chinese Media: An Uncertain Business." *Asian Survey* 48(3): 414-430.

Hood, M. 1994. "The Use and Abuse of Mass Media by Chinese Leaders During the 1980s." in *China's Media, Media's China*, ed. Chin-Chun Lee. Boulder: Westview Press, 37-57.

King, G., Robert O. Keohane & S. Berba. 1994.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Princeton: Princeton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University Press.

Laqueur, W. 1967. *The Fate of the Revolution*.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Li, Z. 2003. *Red-color News Soldier*. London: Phaidon Press.

MacFarquhar, R. 1971. “On Photographs.” *China Quarterly* 46: 289-307.

Peters, B. G. 1998. *Comparative Politics: Theory and Method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Wu, G. 1994. “Command Communication: The Politics of Editorial Formulation in the People’s Daily.” *The China Quarterly* 137: 194-211.

Zagoria, D. S.. 1962. *The Sino-Soviet Conflic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Zhao, Y. 2000. “From Commercialization to Conglomerati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Press within the Orbit of the Party Stat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0(2): 3-2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Power Transitions as Revealed from News Photos:

Jiang Zemin's and Hu Jintao's Photos on *The People's Daily*

*Chien-Wen Kou** & *Shu-Yuan Lia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claims that photographs of Chinese leaders in leading Party newspapers provide first-hand information for understanding interaction among these leaders. Becau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control over mass media, Party newspapers' editorial policies must abide by the directions of the Party central authority. Accordingly, these photographs reflect the changes in leaders' political strength at various stages throughout the power competition. In order to illustrate this argument, this article analyzes Hu Jintao and Jiang Zemin's photos, which were published on the front page of the People's Daily between November 2002 and February 2005. The three indicators used in the analysis are monthly publication frequency of photos, monthly layout scores on the front page, and the figure focused on in the photos.

Keywords: China, Elite Politics, Page Layouts, News Photo, Leading Party Newspapers, Party's Control Over Mass Media

---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E-mail: cwkou@nccu.edu.tw

** Student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E-mail: 92202035@nccu.edu.tw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